



国民必知

当代文学艺术读本



张艳梅 王春林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国民必知当代文学艺术读本

张艳梅 王春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必知当代文学艺术读本/张艳梅，王春林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68-5207-4

I. ①国…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世界文学－现代文学史②艺术史－世界－现代
IV. ①I109.5②J1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310 号

国民必知当代文学艺术读本

张艳梅 王春林 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舒 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207-4

定 价 36.00 元

| 目 录 |

· 上编 文学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	3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	3
第二节 “文革”文学	11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	13
第四节 台湾及海外文学	53

第二章 “二战”后西方文学	61
---------------------	----

第一节 法国文学	61
第二节 苏联（俄）文学	72
第三节 美国文学	81
第四节 英国文学	91
第五节 德国文学	98
第六节 意大利文学	102
第七节 拉美文学	105
第八节 日本文学	111
第九节 其他国家与地区文学	115

· 下编 艺术 ·

第一章 中国当代艺术	123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艺术概述	123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电影	129
第二节	当代中国绘画	161
第三节	当代中国音乐	186
第二章	“二战”后西方艺术	213
第一节	“二战”后西方艺术概述	213
第二节	“二战”后西方电影	218
第三节	“二战”后西方绘画	242
第四节	“二战”后西方音乐	258

上
编

文学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

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转折，总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1949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即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一个新兴政权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确立。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进程也揭开了新的一页。根据文学创作发展的实际状况，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三个历史阶段来加以叙述。

“十七年文学”始于1949年，止于1966年。从文学思潮演进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曾先后出现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事件”，以及“反右”、“批《海瑞罢官》”等运动。这一系列批判运动，正是文学管理层与广大作家之间规训与反规训的一种博弈和对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建立在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基础上的新文学传统，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让位于一体化的共和国文学传统。唯一不同的是，1956—1957年之间，由于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作家们获得了有限程度的自由，于是，也就出现了极其短暂的恢复文学批判精神和人性传统的“百花时代”。一部分作家大胆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另一部分作家则努力打破人性禁区，恢复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如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等。

短暂的“百花时代”之外，按照习惯性的文体分类，“十七年文学”小

说成就最为突出。从文体来说，除中篇小说乏善可陈，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写作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从题材来说，农村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都值得注意。农村题材方面，赵树理的《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以及所谓“山药蛋派”（主要包括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等山西作家），“荷花淀派”（主要包括孙犁、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河北作家），引人注目。革命历史题材方面，代表性作品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茹志娟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等。

“十七年诗歌”以颂歌和战歌为主。除郭小川一些表现自我内在精神矛盾的作品，如《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以及穆旦《葬歌》这样具有地下写作性质的作品之外，“十七年诗歌”所呈现出的颂歌倾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郭沫若、艾青、田间、冯至、臧克家、李季、张志民等从前一个历史时期走来的老一代诗人，还是闻捷、公刘、邵燕祥、李瑛、贺敬之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人，这一时期，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未能够溢出时代的框限，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品质和艺术追求。

颂歌性的时代主题，也出现在散文写作之中。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抒情散文，那些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比如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秦牧的《花城》、《土地》、《古战场春晓》，刘白羽的《日出》、《长江三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其思想主旨，都是对新时代的热情讴歌和衷心赞颂。

话剧的写作情形，也没有越出规训时代的框限之外。那些有影响的话剧作品，无论是直接关注现实生活的《龙须沟》（老舍）、《明朗的天》（曹禺）、《洞箫横吹》（海默）、《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还是历史题材的《关汉卿》（田汉）、《胆剑篇》（曹禺）、《蔡文姬》（郭沫若），都或直接或以曲笔歌颂着“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七年话剧”的经典之作是老舍的三幕剧《茶馆》。在那个大一统的文学时代，能够以悲剧的美学形态表现老北京人的苦难生活，无疑需要足够的艺术勇气。

从当代文学经典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中值得注意的小说家分别是赵树理、孙犁、柳青、杨沫、梁斌，而老舍则以其《茶馆》彪炳史册。

-----小说部分-----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小说多以其故乡晋东南一带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赵树理的主要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登记》、《锻炼锻炼》、《三里湾》等。

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赵树理十七年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取材来说，《三里湾》是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与同时期出现的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创业史》、《山乡巨变》相比较，《三里湾》的特色在于较少受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多地站在乡土社会自身的生活秩序内部来观察描写农村社会情况，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变化与发展。

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展示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主体故事的同时，也穿插了几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婚恋故事。作品集中描写了四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包括三里湾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村支书王金生一家，一向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村长范登高一家，富裕中农“糊涂涂”马多寿一家，还有落后妇女“能不够”一家。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赵树理能够把叙事重心放到家庭生活状况展示上，本身就体现了作家的某种精神超越性。

赵树理自身的思想矛盾性在《三里湾》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作为一位长期拥护党的政策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当然会高度肯定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点，通过他对王金生、王玉生等一批农业合作化积极分子充满热情的描写，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但另一方面，赵树理又是一位不仅尽可能地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且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的优秀作家。赵树理实际上非常清楚农民骨子里对于集体化道路的不情愿。范登高之所以热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糊涂涂”马多寿之所以会在某种程度上“抵制”合作化运动，根本原因均在于此。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看，“糊涂涂”这样的“中间人物”，其审美价值显然要高于王金生一类积极分子。



赵树理（1906—1970）

艺术表现上，《三里湾》体现了赵树理一贯的艺术个性：有头有尾的线性叙事方式，大小故事的相互穿插，更多地通过对话和动作来展示人物性格，浓郁的山西地域特征。



孙犁（1913—2002）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作为一位有着实际革命经历的作家，孙犁身上存在着突出的另类色彩。相比较而言，作家身上的传统文人气质更胜于革命作家的气质。因此，曾经有研究者把他看作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孙犁的文学创作影响广泛，被认为是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是小说的散文化追求。孙犁的主要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山地回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村歌》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曾经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此外，尚有大量散文作品结集行世，影响广泛。

1949年后，孙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关于这部作品，孙犁曾经有创作谈专门谈及：“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小说呢？“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作家的自我言说，能够帮助读者更准确到位地理解这部小说。

所谓“铁木”，指的分别是铁匠傅老刚与木匠黎老东。他们两位不仅在既往的艰难岁月中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友情，而且他们的下一代儿女之间也萌生了堪称青梅竹马的真诚爱情。然而，在1949年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两家的友谊终于破裂，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也随之结束。处于小说文本中心地位的，是两组带有鲜明对比色彩的人物形象：能够安贫乐道的傅老刚与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黎老东；热衷于集体事务的九儿、四儿与贪图安逸、厌恶集体事务的六儿、小满儿。没有把以上两组人物的对立处理成所谓的“阶级冲突”，而只是思想“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差异，就构成了对于时代局限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艺术的超越。

小说相当成功地刻画出了小满儿这样一位年轻女性形象。虽然小说前半

部也在以批判性的笔触写小满儿讲究吃穿、厌恶集体劳动的生活态度，但到了后半部，作家的叙事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情不自禁地写起了这位年轻女性不仅外表可爱，而且也特别灵巧能干：“不管多么复杂的花布，多么新鲜的鞋样，她从来一看就会，做起来又快又好”，“浇起园来可以和最壮实的小伙子竞赛，一个早晨把水井浇干”。显然，作家原先强加在她身上的道德标签已逐渐失去效应，人物本身鲜活真实的个性，自然也就取而代之，成为人物最主要的性格基调。孙犁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时代的艺术窠臼，正是因为他在小说写作中无意识地回到了人性立场。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为了深入体验农村生活，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

柳青的代表作，是具有突出史诗品格追求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同样是旨在透视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与赵树理的《三里湾》相比较，柳青《创业史》与那个政治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显然要密切许多。对于这一点，柳青自己说得很明白：“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为、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渭河平原一个叫作蛤蟆滩的小村庄里，第一部主要写带头人梁生宝巩固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的故事。小说艺术结构庞大而完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新法栽稻等一系列故事情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线索。众多人物形象最终构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阵营：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集体化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苦农民；另一边主要包括土改时被迫低下头、现在试图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刚刚从土改时万般惊慌状态中有所恢复的富裕中农郭世富，以及一门心思个人发家的村长郭振山等。而处于以上两大阵营之间的，是如同梁三老汉这样具有摇摆特征的普通农民。以上三种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应对态度。通过上述描写，柳青展示了不同阶层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柳青（1916—1978）

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是柳青《创业史》一项主要的艺术成就。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积极带领蛤蟆滩的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一位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新时代英雄人物形象。然而其被人诟病的一个缺陷，是柳青艺术处理上的过于理想化。与梁生宝相比较，梁三老汉这一形象具有更为突出的审美价值，堪称典型形象。作为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梁三老汉一直有着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能够如同蛤蟆滩的其他富裕人家一样，早日成为“三合头瓦房院”里的“长者”。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却使梁三老汉的理想无法实现。因此，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面对儿子梁生宝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空前热情，梁三老汉一种深刻的精神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柳青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值得肯定之处，正在于他以生动的笔触，将梁三老汉的这种精神痛苦十分真切地记录了下来。围绕着如何评价梁生宝与梁三老汉这两位人物形象，文学界曾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杨沫（1914—1995）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当代著名小说家。杨沫的小说创作开始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在所能见到的杨沫最早的小说作品，是出版于 1950 年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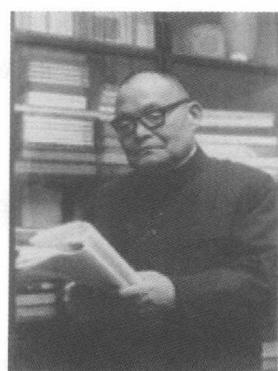
杨沫的小说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明显有着作者杨沫的影子。《青春之歌》主要故事发生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之间。作品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再现了知识分子林道静的人生成长历程：因为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官太太道路而逃离家庭；在北戴河找不到出路备感绝望之际，得到余永泽的帮助；由于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强烈感召，加之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员的阶级启蒙教育，开始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庸自私，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与之决裂；到最后，终于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

作为一部带有“成长小说”典型特征的作品，《青春之歌》成功塑造了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林道静是当代文学中一位少见的精神内涵比较细腻丰富的女性形象。她的思想感情与行为方式，尤其是她在投身于革命之前那种性格上的软弱和幼稚，表现得异常真实。她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终走向革命的思想嬗变过程，也基本上合乎生活与艺术逻辑，令人信服。从总体上说，这一形象既具有比较丰富的女性气质和个性特征，又体现了一定的阶级转变内涵，比较丰满而立体，具有相对突出的审美价值。在知识分子明显受到贬抑的“十七年”期间，以知识分子林道静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之所以取得了合法性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小说通过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指认了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中去，他的生命价值才可能得到证明。杨沫在再版后记中曾经写道：“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学界围绕如何看待《青春之歌》发生过一场文学论争。迫于政治压力，杨沫曾对小说进行过并不成功的修改。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为《红旗谱》三部曲。《红旗谱》三部曲共由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第一部《红旗谱》出版于1958年，主要描写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学潮；第二部《播火记》出版于1963年，主要描写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出版于1983年，主要写抗日战争初起时的农村斗争情况。

梁斌的代表作，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红旗谱》。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叙述的是革命的“起源”。故事发生在大革命前后，地点是冀中平原一个名叫锁井镇的地方。主线是朱、严两家农民三代人（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第三代大贵、二贵、运涛、江涛）与冯兰



梁斌（1914—1996）

池、冯贵堂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楔子”中第一代农民朱老巩与严老祥大闹柳树林，赤膊上阵，拿着铡刀去拼命，另一位朱老明与地主对簿公堂打官司，却“都注定要失败”。这就为“正文”中第二代、第三代主体故事的展开做了必要的对比性铺垫。朱老忠他们终于在接受了党的正确领导之后，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一种小说结构，作品要传达的主题是：“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与严志和两位农民形象。朱老忠是北中国燕赵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具有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农民形象。“为朋友两肋插刀”，“出水才看两腿泥”，可以说是梁斌为朱老忠设定的性格标签。朱老忠不仅这样说，而且也在行动中这样做。朱老忠最终走向革命，是建立在一种坚实的人性基础之上的。背负杀父之仇，多年闯荡江湖，大贵被抓壮丁，这些人性基础决定了朱老忠走向革命的必然性。严志和是一位具有突出乡土根性的农民形象，朴实厚道、惜地如金。这一点，在他与朱老忠以及“宝地”的关系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严志和性格的另一面是貌似软弱的生命坚韧。正因为严志和在遭受一系列人生打击之后，仍然能够以坚定意志战胜这些人生灾难，加入共产党，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殊死抗争，所以，严志和的确称得上是具有真实人性的乡村世界中相当少见的硬汉。

《红旗谱》艺术上的值得称道之处，在于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的兼备。民族风格体现为作家自觉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一些表现手法，比如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性，更多地通过语言和动作来刻画人物。地方色彩一方面体现为民俗风景画的描写，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口语的征用。

戏 剧 部 分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二马》、《离婚》、《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短篇小说《月牙儿》，戏剧作品《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

老舍的话剧代表作，是三幕剧《茶馆》。《茶馆》的三幕戏分别选取“戊

“戊变法”后、北洋军阀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景。在这三个场景中，一方面细致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共同表现出旧时代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蔓延，社会每况愈下、不断衰退。第一幕中，康梁变法失败后，老裕泰茶馆中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物登台表演。一方面是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布社会，麻木的旗兵无所事事，一味寻衅滋事；另一方面是破产农民卖儿卖女，爱国的旗人常四爷因几句牢骚被捕，新兴资本家秦仲义试图实业救国，茶馆老板王利发左右周旋，维持生意。第二幕、第三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开女招待“托拉斯”；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而另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民族资本家秦仲义抗战中被日本人抢走财产，抗战后国民党当局将其当做逆产没收，令其彻底破产；做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妄图改良，赶上时代的“发展”，没想到生意却越做越坏，到最后连茶馆也干脆保不住了；一向被称作“铁杆庄稼”可以“吃皇粮”的旗人常四爷成为自食其力的小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结尾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王利发悬梁自尽。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结尾，弥漫着一片阴冷凄凉的氛围，既是对旧时代的强烈控诉，也在为旧时代唱最后的挽歌。

艺术结构上，《茶馆》采用了一种“人物群像式”的结构方式，出场人物众多，堪称老北平旧时代民间生活的“浮世绘”。《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部杰作。



老舍（1899—1966）

第二节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始于1966年，止于1976年，即“文革”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存在状态。“文革”十年，是对思想文化极端禁锢、全面破坏，几乎彻

底摧毁的黑暗年代。本应多元繁荣的文学写作领域，百花凋零，一片荒芜。“文革文学”的凋零状况，与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存在着密切关联。“纪要”既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成就，也否定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的文学成就。《纪要》认为，1949年之后的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由于受到《纪要》的主导性影响，整个“文革”时期，只剩下浩然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能够看到，还有部分红卫兵诗歌，以及广泛流行的八个样板戏。被江青标举为“样板”的八个戏分别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在浩然《金光大道》之类的主流文学之外，“文革”期间，还有一种文学现象不容忽视，即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潜在写作，或者称之为地下写作。潜在写作的文体，主要存在于诗歌领域。其写作者有两大群体：一是曾经活跃于“反右”运动前的老作家群体，主要包括流沙河、曾卓、牛汉、绿原、穆旦、蔡其矫等；另一个则是以知青为主体构成的青年诗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洋淀诗群”，根子（岳重）、多多（栗世征）、芒克（姜世伟）等，是这个诗派的主要成员。除了“白洋淀诗群”，食指（郭路生）的诗歌影响很大，他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等在当时广为流传。另外，诸如北岛、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也都在“文革”期间开始了自己最初的诗歌写作。

这两大诗歌群体的诗作，一方面，以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觉醒者先行姿态，对“文革”苦难有所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也在不无坚定地表达着自己的理想精神追求。曾卓在《悬崖边的树》中写道：“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顽强//它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而食指则在《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分别吟诵道：“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和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